

中国人
的

人生观

《中国人》丛书

吴非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的

人生观

吴非
著

《中国人》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丛书

中国人的人生观

吴非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申光制版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6.25 字数 159,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171-0
G·96 定价:10.00 元

总 序

余秋雨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这个词早就出现在西周，内涵几经变化。秦汉以后，历朝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当然最后大家终于尽力兼容互包到这个概念里边了。但是，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

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总之必须出自人与人的群体性、近距离对照，而不是两种文明在商品、器物、艺术上的交流和个别旅行家的传奇见闻。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在中国方面，把“中国人”当作一个独立的题目进行剖析而产生影响的，有辜鸿铭、林语堂、柏杨、项退结等人，而其他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个题目。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

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着这样的漫画，与读柏杨先生痛快淋漓地对中国人进行自我解剖时的心境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样的漫画本身就是异族对中国人的放肆践踏，而柏杨先生则是以自己人的身份重话警策，以免继续遭受旁人践踏。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深。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

入有关自己的思考吧。

相信会有宏著巨论出来，但论著再好，也代替不了群体投入。因此，应该有很多普及性的读物出来，加以推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人》丛书便是这样的读物。

为了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丛书摆脱了枯燥的学理形式，以随笔式的自由，一题一篇地娓娓而谈。渐渐谈成一个大问题便汇拢成书，拆开来读又各自成篇。虽然谈得轻松，但涉及的内容却未必是一切专家学者都容易驾驭的，因此这套普及丛书其实也可算是学术小丛书。从最低限度论之，它开辟了话题，开辟了素材，足以滋养和启发更深入的研究计划。

思考可以有多种态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思考最好是平心静气。为此，丛书的风格追求温厚随和，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偏激极端。由于不必纳入整饬严密的结构，立论的弹性很大，有时甚至以不修边幅的形态出现。试想，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多种难题，怎么能轻易地找到一条严谨的道路以通达简明的结论呢？不如以一种开放结构，闲散谈去，使一切读者也感受到加入交谈的极大可能。估计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有简单结论，参与了梳理，参与了反省，参与了共同解剖，然后增长一分作为中国人的自觉性，这比什么结论都更有意思。

是为序。

1997年4月25日晨

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

(代序)

这本书其实可以算是命题作文。人生观之论，本该由社会学家或是理论宣传家来做，找杂文写匠捉刀，无非是要他设法说得形象一些，不要让人看得太吃力。然而一求生动形象就不免会失却庄重。人生不是儿戏，论人生更不是儿戏，因而下笔不能完全做到放言无惮；料想读者也是可以体谅的。

说不尽的人生、说不尽的世象、说不尽的变化、说不尽的发展，然而要论到人生观，无论是舍身取义、建功立业、忧国忧民、文死谏武死战，还是醉生梦死、得过且过、逍遥乐天、恬淡中庸……每一种处世态度，都有从老祖宗那里接过来的“金箴”。20世纪的世俗人生，种种“活法”，却早已在二十个世纪前就被圣哲论透。所以想想现今之人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狂妄的。孔子说“仁”讲“礼”，积极干预生活，他像一盏灯，在风雨中忽明忽暗地飘摇，但是毕竟照耀了两千多年；道貌岸然的老子主张“绝仁去义”，鼓吹“无为”；悲观的庄子“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在虚无之中寻求解脱，幻想着“逍遥”，然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位痛苦的智者心灵所受到的折磨；执著的孟子捧着孔子的衣钵，活得比孔子舒坦，却喊出了一句“民贵君轻”；不走运的墨子生在人欲横流的时代，他的“万事莫贵于义”竟无人喝彩，于是他的平等兼爱主义成了空想……无论社会在怎样进步，哲学在怎样发展，我们观今天的世态，还是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人很难彻底地摆脱祖宗的人生哲学。而先哲们就在半空中观看着人间在继承、在发展、在歪曲、在改造着从他们发轫

的种种人生态度。

写作这本书的最大苦恼，就是每每写下“中国人”三字时，总觉得好像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我基本没发现中国人在人生观方面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完全一致之处。若论及的是美德，当然不会有人指我为谀众；若说破的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的暗昧心态，则毫无疑问，必有人责我为诬蔑。虽说当今常常以偏概全，如把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美德当作全民必有，而一旦论及有失面子的事，必定要用“极少数”、“极个别”圈定范围（这和用恶谥笼统地覆盖敌手有天壤之别）。谈天说地，但凡出现“中国人”的字样，真是要慎之又慎。然则若是把行文改为“有些中国人”、“中国有些人”，则不免谨小慎微。但是，无论是谁来谈人生观问题，大概都免不了“以偏概偏”，于是索性不去管它。

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从来就没有人敢说已把中国人的问题研究透彻，而这样一本泛泛之论，又根本不可能涵盖中国人人生观的全部，更不必说对已经流逝过去五千年的祖先的人生尚缺少清醒而权威的总结，这样一个大问题，岂容一个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我想起自己和很多朋友有过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一两个人给我们写过的所谓“鉴定”、“评语”、“小结”之类的东西当回事，那不过是一两个人的意见，而我们活得很好。如是而已。

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解释言犹未尽的原因。“人生观”实在是难做的大文章，倘读者能想到这个难处，我也就不至于有芒刺在背的惶恐了。

吴 非

1996年6月

目 录

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代序)

	*	*	*
永不轻松的“任重道远”.....	1		
先忧者的命运.....	4		
穷则独善其身.....	7		
“匹夫有责”的新生.....	10		
雨中的呆子.....	14		
“奉献”种种.....	17		
到底何为“事业心”.....	20		
死观.....	24		
	*	*	*
光宗耀祖的苦难历程.....	27		
尊卑贵贱 芸芸众生.....	30		
人往高处走 高处不胜寒.....	34		
说尽辛苦为名声.....	37		
“争光”论.....	41		
你到底要信什么.....	44		
知识阶层的尴尬.....	47		
如此“社会责任”.....	50		
	*	*	*
想说真话不容易.....	53		

内讧与宽容.....	57
主子与奴隶、奴仆	60
“他又睡着了.....”.....	63
读《红楼梦》所想到的.....	65
睡狮有什么可怕的.....	68
见死不救 由来已久.....	70
同情与互助.....	73
知恩报恩.....	76

*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9
中庸是一种“不得已”.....	82
“老二主义”.....	85
唐僧将提拔谁.....	88
“材与不材之间”.....	91
狂与狷.....	95
娄师德与司马徽长生不老.....	98

*

*

*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101
庄子式的消极.....	105
渺小与短暂.....	109
与世推移.....	111
“混”之梦.....	114
利己不一定等于可耻.....	116
自在最为难得.....	118

*

*

*

“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121
“忍”到何时方是休.....	125
“小猪发疯”式的冲动.....	128

淡泊成假出闲人.....	131
他们不愿孤独.....	134
嫉妒的利剑.....	136
虚张声势的“号称”.....	139
糊涂一时 争斗一世.....	142

*

*

*

各有各的乐法.....	144
知足常乐.....	147
苦与乐.....	150
做官乐.....	153
读书是一种风雅.....	158
悠闲的生活.....	161

*

*

*

教人安分赖“天命”.....	165
“天命”命你忠厚.....	168
天网恢恢.....	171

*

*

*

俭以养德.....	174
人多困于所“溺”.....	177
富而骄人.....	179
俭奢与兴亡.....	182
“要酬平生不足也”.....	185

永不轻松的“任重道远”

《离骚》中最让人觉得是圣贤之言的，也许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莫属，比之当代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其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是多了一些，因为屈原没有意识到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他上下而求索，或得光明，或坠入黑暗，不如今之人们高瞻远瞩，永远能看到光明，心里亮堂。屈原的一生，哀民生之多艰，忧君王之暗昧，真是因受苦受难而伟大，几千年以来，理论家批评家把翻案文章做尽，也没有人敢对屈原不敬，实在是因为不敢不敬重他那任重道远的殉道者的伟大一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里提出的“任”，是天下之任，君子之任，自然不能说不重；路途漫漫，一直到生命终结，根本不存在什么“阶段性胜利”，因此不能说不远。以一家一姓为己任，就无所谓“重”，即使不堪负荷，也可以随时歇挑子的。然古之君子不取，偏要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这是以国事为家事，以天下事为己任，这就是中国式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后世骂孔夫子，有些话骂得真够得上狗血淋头；后世捧孔夫子，也能把他捧得如神明。是荣是辱，孔夫子是不关心了，但我们今天的确很难想象，中国没有孔夫子会是什么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是孔子的一生，过得何其艰难！后世之所以敢对他老人家指手画脚，是因为他不像某些人那样惯于使用瞒骗战术（连

自身的经历也讳莫如深),而是坦荡地把自己的一生所思无保留地留给后人,在这种坦荡的展示中,我们看到伟大人物的胸襟,看到了实践家极不轻松的一生。如以成败论英雄,以“动机效果一致论”,他们的人生目的都没达到。在中国,“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才算是英雄;马上得天下,折冲樽俎,“不战而屈人之兵”,才算是英雄。思想家忧患的一生,大多耗在与统治者的折腾上,故谈不上是什么功业,又因为他始终在思想,所以他们永无轻松的时候。

通常以为庄子是最潇洒的,其实他也并不如他自诩的那样洒脱,他既不愿“巾笥而藏之庙堂”(《庄子·秋水》),那就应当彻底地混完一生,何必要孜孜矻矻地写下那洋洋洒洒的几十篇大文呢?以他居陋巷,贷粟于人,破衣烂鞋的生活水平而去当思想家,这一生又怎能轻松得了呢?

战国时代,对有文化的人来说,可能是最不轻松的时代,识字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定小到了极点,于是天下的事全要压在这一小部分人的肩上。而到了汉唐之后,地主阶级发展壮大,才逐渐出现了悠闲的生活方式。看《三国演义》刘备南阳寻访诸葛亮一段,让人看到群雄混战之际,竟还有那样的人间桃源;但是原来一身轻松的诸葛亮被刘备请出,便任重道远、鞠躬尽瘁,他那在一身轻松的闲居之日修炼出来的智慧,便在“兴复汉室”的“任”下使他永不轻松了。

就能人来说,即使真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恐怕也没有人敢像唐宋元明清的逍遥派那样恋情山水,偃仰啸歌,他们视焚膏继晷事必躬亲为己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为头颅而为事业。曹植虽不得重用,吃穿不愁,日子过得应当说是不错的,但却觉得无聊,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十六首》)。中国的历史要是没有少数人的永不轻松,恐怕根本就没有光明可言,也许还不知道要在曲折的道路上再摸索徘徊多少年。近代如孙中山,真是一天安逸的日子也不曾有过,辛亥的前十年,辛亥的后十年,他的忧患与所

经历过的艰险，真可以说非人世所堪。

任重道远，成功与否，却不得而知，因此前驱就少，做了路人的居多。但前驱并不需要路人以壮声势，倒是后来者需要多一点的人走在前面把路踩得平坦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驱难能可贵，而能与前驱当上一程同路人也该是贡献。中国人也有正义的冲动，在正义冲动下，也能与开拓者同路奋斗一番，同路可长可短，贡献总是有一点的。同路也可得利益，而当开拓遇到险阻，路人四散，开拓者义无反顾，冒死前驱，踩出一条血路后，人们尊他们为圣贤，是因为他们知难行难，寂寞孤独。

任重道远，固然需要有人呐喊助威，然而呐喊鼓噪能得路人追随一程倒还有用，最要命的是不但不呐喊，而且成看客，看客也罢，更让前驱悲伤的也许是见看客投机有好处，就“入股前进”，没有好处，就扯起反旗拆台。中国任重道远的前驱者总是不得不停下来挡背后的冷箭，所以圣贤的胸前背后都会有着累累的伤疤。

有人说，在中国搞改革的都难有“好下场”，这当然是愤懑之言。思想的前驱本来的任务就是用血肉之躯筑路，让后来的人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如果视此为不好的“下场”，那倒是本分；有人保驾，有人抬轿，安然地踩着别人的头颅走向“好下场”的，不是皇帝，就是政客。

先忧者的命运

历史上举凡被杀头的思想家，大多都是先于皇帝或专制势力看到了世界的“忧”，这种难得的慧眼，本当是世界的幸福，然而谁先明白过来，谁先醒过来，谁先说国王的“新装”其实是赤身裸体，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专制的板斧就得落在他的脖子上。所以，不经世事的书呆子总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可以申请专利、得发现权发明权一类的美事，其实大谬不然也。能“先忧”，先要有勇气，有责任感，不怕贬官掉脑袋，不怕给自己添烦恼。

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眼力。社会从来就不缺有责任感的人，但有责任感未必就“忧”得起来；因此可以说从来就多乱卖力气的笨蛋和不肯出力气的聪明人。既要有责任感，还得有点真功夫，这“忧”才是有价值的。最简单的例子是“曲突徙薪”：忧者见火灾不免，热情地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如果他看了不说，或者拿不定主意，最后只能与救火者一同焦头烂额。这些，都不足为智者。这个故事略有欠缺的是：当火终于烧起来的时候，这个建议“曲突徙薪”的人物是在观火呢，还是暂时不指责笨蛋，先加入救火者的队伍共同焦头烂额呢？照时下中国社会的观念，是不准光说不干，当群众行动起来时，不得在一旁败坏情绪。也就是说，既要有先“忧”的勇气，而在忧患已成时，仁人志士也不能只做旁观的预见家，而还得勉力做赴汤蹈火的实干家，否则就要被当成没有诚意没有同情心的不负责任的异类。这种过高的要求便使中国社会出现了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的人生态度，即使看到了危险也不必出声，久而久之，说了也白说，白说就不说，不说就不忧，大家都快活。更何况原本就怕你比他聪明的人物，能让你比他有眼力吗？袁绍南下攻许都，田丰看到曹操非等闲之辈，劝袁绍以逸待劳，袁绍不听；田丰一再劝谏，袁绍便把这位硬要“先忧”的人关进大牢。袁绍兵败，人们以为他从此要把小神仙一般料事如神的田丰奉为上宾，田丰倒是看得又比凡人远一点，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今天要替田丰扼腕叹惜的人，一定会奇怪，这种走一步看十步的人为何没能看透袁绍竖子不足与谋呢？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先忧”者们以身殉道的传统，他们为自己的职责而活，他们为自己的人格光荣而活，这种冲动执著不是为了显示或证明自己的智慧，而是为了证明世事发展的规律。孔子是先忧者，屈原是先忧者，贾谊、晁错是先忧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是先忧者，孙中山是先忧者……他们都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人们面前表现出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发出了与社会不和谐的声音，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全都言中了。

中国社会有一种很怪的“鸡叫论”，认为鸡应当应时而啼，否则就不是好鸡。三更鸡叫，二点九更便叫是逞能，三点一更才叫是偷懒，都有被杀了清炖或是红烧的危险。即使有人撬锁挖洞，黄鼠狼光临，地震火警，这鸡都应当自觉地闭口，以等三更正点。这种混帐哲学的盛行，就逐渐养成了中国人的“国事管他娘”的坏毛病；这种专制重压下造就的，只能是愚蠢怯懦的“守本分”的国民性格。中国早先的茶馆里贴的“莫谈国是”，是要把臣民起码的政治热情也要镇压下去。等到洋鬼子把大炮架到宫廷的大门口，他才怪自己受了奸人的蒙蔽。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发现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同时也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享乐主义者。既先于天下人而忧国事，自然也就“乐”不起来。凡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都是有“忘忧”的